

# 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理论

胡 一 伟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场域”一词可指人类生存的居所,也可指外在于人的、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置身性空间。而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一词主要指符号场域,它强调符号意义生成与传播的场域空间。符号场域之场位或在场者的置身性角度(身份等)会作用于符号赋意活动,以影响意义生成与传播过程。而整个场域的空间结构中,在场者的身份不同,意义的生成与传播活动又会随之变化。符号场域的空间性关系、人的置身性位置这些在场的空间性结构方式会通过赋意行为作用于传播效果,它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活动呈现出来。

**关键词:**符号场域;意义活动;分节;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6-0097-07

DOI:10.13764/j.cnki.ncds.2017.06.014

“场域”(field)一词可指人类生存的居所,或指外在于人的、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置身性空间等含义。不同的研究领域之下,该词所指涉的范围则显现出一定的差异。譬如,在物理学研究中,“场域”一词指某一具体的物理空间;而在人文学科之中,它还强调关涉人们身份、阶级等方面的置身性空间。由于传播符号学的研究目的是讨论意义在符号社会中的生成问题,对意义活动的探讨绕不过对符号场域的研究,因此从传播符号学视角出发审视“场域”一词,即是站在人文学科的立场讨论符号场域,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传播活动。本文将梳理“场域”一词指涉的含义,并对其进行分节,以探索多重符号场域之中人的置身性角度对意义活动的影响。

## 一 传统“场域”研究的理念和路径

“场域”源自物理学概念,指物体周围传递重力或磁力的空间。后被引入社会科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其中以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场论最为著名。他认为“场域”指生活空间(life space),是“特定时间,决定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是一个个体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及被主观化了

的客观环境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sup>[1] (P405)</sup>。显然,勒温将“场域”理论视为“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科学结构的方法”<sup>[2] (P201)</sup>。尔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这种方法推向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高峰。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场域”考察分为两大方面,一是考察“场域”之中的“他者”与自我(主体)之间的历史—社会意义关系,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便是一例;二是考察心理学与意义的产生—传播之间的关联,如勒温的“团体动力场”、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的“心物场”。他们无论是从后结构主义还是格式塔心理学角度出发,均是对意义出场及在场方式的一种考量,同时承认了场域性对意义的建构作用。由于人们对“场域”的集中讨论始于法国学界,如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不同流派的学者均对“场域”一词有过相关论述,因此,笔者将从西方学界中的“场域”观念说起。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仅将“场域”视为一个研究背景,主要研究“场域”中的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他认为“同一实践场域的实践在客观上加强了群体—客体的联系”<sup>[3] (P507)</sup>,要发挥出个体的自由意识则需摒除群体意识的干扰,而这一观

收稿日期:2017-06-28

基金项目: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戏剧演出的传播场域研究”(XW162007)。

作者简介:胡一伟(1988-),女,江西南昌人,讲师,文学博士,从事传播符号学、演出符号学研究。

点实际上出于存在主义者对自在和自为之关系的关心。可以说,萨特对“场域”的探讨,实际上是为了说明他者与自我、客观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而“场域”则是两重关系展开的一个抽象的空间。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则从知觉现象学(通过身体符号以及感官渠道等)角度构架了“场域”概念。他融合了海德格尔与胡塞尔思想,用“惯习身体”(habitual body)和“现时身体”(present body)说明了场域的历史性——因为主体身体带有不同阶段的时空印迹。此处,梅洛-庞蒂选择从身体感知进入场域研究,这里的场域是身体的场域,是历史的场域。不仅如此,梅洛-庞蒂在对身体性进行考察(依据身体印迹)之时,实际上也在对场域进行划分。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不仅强调历史实践的场域,还对自我在场的幻想作了一次彻底的解构。他认为历史场域中的符号意义具有流动性(符号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符号并不恰好是“在场者的意义”“正在出场的事件的意义”“被嵌合于自身的在场的存在以及作为在场的他人的正当物的意义”<sup>[4][P40]</sup>,从而激起了人们对在场事物不信任的意味。这里,德里达注意到场域的一个属性问题——场域是具有流动性的,它含有从缺席—正在出场—生成在场这样一个变动的过程。

布尔迪厄的“社会场域”则继承发展了萨特、梅洛-庞蒂、德里达等人的“场域”理论。其中,他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当时布氏就提出了资本、习性、实践等概念)是推动他转向“场域”研究的关键点。布尔迪厄着重于从关系性角度探讨“场域”,并将其投身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这使得他所探讨的“场域”带有了明显的空间性、社会性。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了“主体场域”与“客体场域”的关系性、结构性,以及“场域”的状态(是敞开的、交流着的)与边界。正是由于布尔迪厄意识到场域的空间结构性关系,因此他对场域的划分较为全面,即从主客体、动态性与静态性等方面审视不同的场域。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场性问题时,也阐述了有关“场域”的观念。不过,他是站在“主体场域”视角上观察客观语境对主体的影响。由于伽达默尔的发生学、阐释学以对线性历史的解释为底色——更多指向以往历史客体的“在场”,而场域的空间性存在与历史语境便成了他所注重的部分。可见,伽达默尔的“场域”研究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列伏菲尔(Henri Lefebvre)将“场域”更进一步地推向了日常生活空间,并由日常生活场域空间的异化转向了城市与“空间生产”的辩证法道路。列伏菲尔深度分析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与“居所”之间的张力关系,认为资本生产与空间、阶级分层与空间的关系均是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揭示、被发掘出来的。确切地说,列伏菲尔所研究的“场域”是将空间发展置入资本发展的历史性进程的符号场域,此时,意义在时空的压缩、异化过程中出场。

继列伏菲尔对资本场域的研究之后,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都从“空间生产的正义”的角度不断触及在场者的“场域”问题。哈维同样持有“时空压缩”观念,强调了资本的空间性、空间的压缩与归属性质。随着时空的压缩,场域主体与场域客体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关系。这里,他们共同揭示了场域中的时空压缩以及异化作用与对意义生产过程的改造作用。

纵观上述学者的“场域”观念,他们的研究路径呈现出一定的承接性。在不同学者带有倾向性的观念中可以发现,这种承接性尤为明显:萨特反复提及的“场域”仅被作为研究背景,其研究内容仍停留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之上。梅洛-庞蒂将“场域”视为研究对象,但只讨论了身体知觉的惯习,忽视了行动者本身的社会实践作用。德里达意识到历史实践场域中符号意义的流动性,而其对意义生成具有时间性向度的批判,又使得他对符号意义的理解充满了虚无主义的意味。尽管布尔迪厄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将主客体场域紧密联系起来,可他论述的基础依旧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再现和客观环境先验性的化约上,这使其后的论述(如对习性的论述)与充满可观性质的“场域”不相衔接。另外,布尔迪厄对“场域”边界的确立陷入了无限的细分之中,使得其研究显得更为微观。伽达默尔则与布尔迪厄的阐述立场不同,因为伽达默尔更侧重于历史的客体存在。列伏菲尔、卡斯特尔斯、哈维则将视角指向了当下社会实践生活之中,更进一步探讨“场域”的空间性、生产性以及在场者、行动者(agent)的问题。

这里西方学者所追问的“场域”,是一个符号集合(如文学场、心理场、社会场等),对这个符号集合的研究体现了他们在语言学、历史学、现象学、社会学、阐释学范式方面的运用。无论是采用何种研究范式,学者们论述“场域”问题之时,主要围绕着“场域”之在场性,在“场”中的“人”即编码者与解码者

(或称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形塑者与解释者),“场域”的时空结构,“场主”由纯粹感知上升到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与由交往实践到互为主体的唯物主义等方面展开。其中,每一阶段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侧重点——或展开理论研究或开展实证研究;或践行微观研究或进行宏观探索;或注重主体场域或倾向客体场域。

## 二 “场域”的新内涵:作为符号集合

尽管上述涉及场域研究的理论各有侧重,但西方学者们对“场域”的研究均直指了符号意义的生成与传递活动(比如,勒温讨论了个体与群体心理的符号化,布尔迪厄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符号化等等)。在论述“场域”问题时,他们均围绕以下四点展开:

### 第一 意义之在场与缺场的循环阐释

学者们对“场域”之在场性的探讨,隐含了不同阶段中意义由缺场到在场的转换,即意义的动态建构涉及“缺场”—“入场”—“在场”三个阶段,它与符号之所以被感知为符号经历的阶段——“未感知”“感知为物”和“感知为符号”相呼应。由此,透过“在场”及“入场”之行径,可寻出物—符号的转变过程和意义的生成—传递踪迹,并察其规律。

### 第二 意义之新旧更替

从勒温到布尔迪厄等人对场域观念的论述,都体现出符号意义的衍生与更替。同一符号在不同场域中被赋予的意义不同,譬如就勒温看来,意义的传播与群体观念、动机、行为、倾向等心理因素相关联,即受温勒所说的群体动力作用之下,符号意义会发生改变。而在布尔迪厄的政治、经济等场域中,符号意义则带上了权力与资本色彩。也就是说,赋意与意义无限衍义的过程——从有无感知意义到不同意义的先后更迭,均展现出了建构意义的运动态势。而透过原有意义的建构过程审视全新意义的建构过程,又可触及传播场域的文化性质。

### 第三 符号意义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相互争夺

追问“场域”理论始终体现了学者们欲打通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宏观和微观这两个二元对立的分离状态。前者看重行动者的能动性,强调自我对符号的创造性阐述;后者看重社会规律(客观结构)对社会运行(包括个体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力求还原客观真实。而主客观视阈的融合为意义传播提供了一个平衡的支点。

## 第四 意义生成—传递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

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曾说当“解释项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以至无穷,符号就是我们为了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sup>[5] (P303)</sup>,换言之“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sup>[6] (P2)</sup>。“以至无穷”的延续性和推动不断解释的潜力形塑了一个结构化的空间,它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特性囊括于其中。而“场域”本就是一个关系化、结构化的空间——“场域被定义为在各种未知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sup>[7] (P133-134)</sup>,此处的网络或构型也体现了各种符号历时性与共时性关系的交织。也就是说,意义是在历史与当下、时间与空间不断延异的动态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且强调历史真实与注重当下交往实践二者并不相违背。

可见,分析“场域”问题实则是展开了一次符号学探寻,虽然场域是由物理学概念引入社会科学中的,但是“场域”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即指意义生成与传播的集合地。而从不同阶段的研究模式来看,符号学研究是由语言学模式、逻辑—修辞学模式到社会文化论、信息论模式的产物,从“场域”理论的探讨中也可发现这些模式留下的印痕。这使得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与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符号学代表人物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所论的“符号域”就极其相似性(都在某种层面上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等学理的影响)。洛特曼认为“符号域”的一种符号体系存在和运作的文化空间,具有多层级性的各种文化文本符号堆积着,共存于这个交错而成的符号域内,其中“交流与对话是符号域的构成基础”<sup>[8]</sup>。布尔迪厄所论及的“场域”亦是各种文化符号交织而成的一个网络和构型。它们均是被结构化了的社会文化空间,是以交流对话为基础的开放的空间。

从“场域”理论中的多个关键论题来看,“场域”之在场性即是探讨符号意义的赋予与实现(或考察符号过程);对“场”中的“人”(编码者与解码者,或称自我与他者)的探讨即是在分析符号主体/发送者和符号客体/接收者之间的关系。“场域”的时空结构恰似在分析符号的表意距离问题,及影响符号“无限衍义”与“封闭漂流”之下的语意场;对由纯粹感知上升到自我意识过程的唯心主义与由交往实践到互为主体的唯物主义之争则和区分对象(object)、再现体(representatum)、解释项(interpretant)三者之关系有一定联系。

总之,“场域”即符号场域,它是包括了布尔迪厄提出的“媒介场域”的(因为这里的媒介仅指规模生产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意义的生产过程之中,当某一对象或意义不在场,就需要另一媒介形成的符号来代替它,而场域便是由众多符号汇集而成的,是符号的场域也是媒介的场域。它犹如勒温所阐述的整体性存在——不是场内各部分特征的总和或相加,场域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新的结构实体,不再是形成场的那些个体元素的机械结合。而探索符号赋意活动(意义的生成与传播)及其规律,实际上也是在展开传播学研究。

### 三 六重符号场域及其功用

符号场域所卷入的不同因素会使符号意义的传播发生偏差,这在大众传播系统中最为明显,因为大众传播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是在非平衡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系统,它更具有开放性、不稳定性、使役性、涨落性等。为了更进一步的讨论符号场域中意义生成活动,有必要对符号场域进行分节(articulation)。而艾科就曾强调过这种切分方式的重要性:“任何符号学课题是对世界进行切分的历史和社会的结果。”<sup>[10] [P315]</sup>

诚然,分析“场域”理论之际,布尔迪厄对其也有过细致的划分。他将场域分为四个大类:资本与权力相连接的经济场域;以社会再生产与象征暴力为特质的社会场域;充满习性(habitus)与素质(disposition)的文化场域;富有品味与雅趣的审美场域。布尔迪厄如此划分场域的依据源自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根据资本的不同作用,其类型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实际上,这一划分并未将“场域”这一对象世界真正的切割开来:一方面,布尔迪厄所论“场域”之边界并不明确;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文化场域还是审美场域,四个场域均是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这就造成了布尔迪厄在“场域”划分问题上的模糊不清。

笔者认为,站在人文学科立场上对“场域”的分节,首先需要回到人文学科所说理解的“场”的概念上,并从“出场”“入场”的行为说起。“场”与舞台演出有关,将其放置于哲学视域中,它并非仅指剧院的台场,还可指涉整个人类历史的宏大舞台。“入场”是由隐蔽状态进入某一特定场域中的行为,“出场”是亲临历史舞台的行动,“出场”“入场”的行为恰恰将宏大历史舞台的边界显现了出来。由此,笔

者以人类最早的演示传播行为出发,即从表演场域出发,讨论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场域问题。也就是先从戏剧舞台上的表演场域,上升到整个宏大历史宇宙的表演场域,做一次“分节”(根据广义的表演概念对整个符号场域进行划分),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六重场域:

第一重为宇宙世界之表演场域。不论是否处于有机界,是何物种,凡矛盾冲突存在之处,便可寻得“戏剧性”,即这一场域之中“处处皆有戏”。

第二重为大自然之表演场域。因为“戏剧性”似乎常见于芸芸众生(生物、人类或有机界)的生存竞争之中,在这一场域之中“既生便入戏”。

第三重为日常生活之表演场域。所有“戏剧性”均与社会性的交往活动有关,它属于一种实在世界中的社会角色扮演活动,所以在这一场域之中“人生即如戏”。

第四重为泛艺术之表演场域。这里指将“假定性”赋予自身,由此出发进行某种交流活动。它与本身就具有多重身份的人,根据情境需要而进行某种选择的情况不同,它更强调对某种身份的“假定”,所以在这一场域之中“假定方为戏”。

第五重为虚拟网络之表演场域。“戏剧”是在改换身份(如改名、换网名或IP)的情况下,进行交往形成的。所以在这一场域之中“变脸可言戏”。它与“假定方为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属于数码虚拟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互动交流的一种情况,而“假定方为戏”则属于虚构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互动交流的一种情况。

第六重为戏剧舞台之表演场域。这一场域与前面五重场域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位于二度区隔(类似于戏剧的“第四堵墙”)之内,演员明知假戏而“真”做,观众假戏假看(其中嵌套了真戏真看),即“虚构方为戏”。

这六重场域大致是环套式的(上一层包括下一层在内,第四层与第五层有其模糊的边界),它类似于按照媒介依赖关系变化产生的“波纹效果”(Ripple Effect)——“它始于旋斗上端的媒介在社会中的位置,螺旋下降贯穿于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组织和人际网络的依赖关系,直到与个人的依赖关系媒介系统的社会作用的变化,在社会行动的所有层次都会有所波及。这种作用的变化具有增大各社会系统、组织、人际网络和个人的媒介依赖性的效果”<sup>[11] [P362]</sup>。

不同的是,此处由宏观到微观的场域分层是以

符号身份为依据的,我们可通过广义的表演与符号身份二者关系作进一步审视:

表1 表演与符号身份的对应关系

“表演”一词可涵盖范围	张力关系	身份问题
舞台上的戏剧演出或“准戏剧演出”	各种假定性身份之间的张力关系	同一虚构世界中不同身份的分化
网络世界中的虚拟“扮演”	多种虚拟身份之间的张力关系,或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之间的张力关系	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不同身份的转化
泛艺术空间中的戏剧演出	真实身份与假定身份之间的张力关系	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不同身份的转化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扮演”	多种社会身份之间的张力关系	现实世界不同身份的分化
自然界中的角色“扮演”	原发性身份与被赋予的身份之间的张力关系	现实世界不同身份的转化
宇宙世界中的“扮演”	任一变化(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成)之间的张力	可能世界中的身份赋予

上表依据可能世界理论及符号身份对表演的不同场域进行了“分节”。其中,身份关系间的张力可理解为广义的“戏剧性”,而所在世界(在一度区隔、还是二度区隔之内)、所存身份的性质会影响意义的出场方式。譬如,在戏剧舞台中,对某一符号意义的阐释便不同于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一符号意义的阐释。因为戏剧演出以假定性、虚构性为基础;而日常生活中的演示性传播则是以纪实性为基础的。又如,在网络虚拟“扮演”之中,“其面向分众及其自适当前情境的多态(polymorphism)”<sup>[12]</sup>会作用于多种虚拟身份之间的张力关系,在传播层面上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的同时,也为意义的生产提供了多种可能。

这六重符号场域是由外而内进行分节的。根据一度再现的区隔以及再现之再现的区隔(二度区隔),六重“场域”也可大致归并为三重符号场域:“准戏剧表演”场域、“类戏剧表演”场域、“泛戏剧表演”场域。三重场域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三重模仿相似,“第一重模仿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对‘经验的叙述性质’的前理解……第二重模仿指的是叙事的自我构造,它建立在话语内部的叙事编码的基础上……第三重模仿指的是叙事对现实的虚构再现”<sup>[13] [P76]</sup>。

而无论是几重符号场域,上一重符号场域均为下一重场域的解释努力提供了“由各种因素组成的

释义元语言集合”的支撑,这是因为“符号文本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参与构筑文本解释需要的元语言集合”,它们大致有三类分别是体现文本与社会诸种关系的语境元语言、与解释者社会性成长经历密切相关的能力元语言(也包括阐释者的感情和信仰)、符号文本的自携元语言<sup>[6] [P233]</sup>。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元语言集合”体现了场域位置的空间性,元语言集合亦然。这即是说,除了发送者与接收者的身份因素会影响符号意义的阐释,符号场域与符号场域之间支撑与映射关系,对意义生成与传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并且,它们反过来作用于符号的传播类型,即将传播类型分为人类传播、非人类传播,其中人类传播涵盖了非社会传播与社会传播(又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些传播类型均可与表1分析的广义表演场域与符号身份关系的六个层面相对应,他们共同体现出了符号场域、身份、传播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总之,不论是在哪一层场域之中,符号的发送者与接收者基于何种符号身份展开的意义活动,符号场域之间的空间性关系、人的置身性位置均作用在符号意义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之中。

#### 四 传播即符号在场和意义的出场

在符号表意的过程中,传播是“正在生成”的行为过程,而被解释的潜力促成了“正在生成”的运动,意义便在每一个环节的“正在生成”运动中建构了起来。由此,对“场域”问题的追问,实际上是考察了意义的建构活动,是对符号表意以及意义传播规律的一种探寻。更进一步地说,“场域”即符号传播场域,其性质以及在场者所处的位置影响着意义活动。

那么,符号场域、在场者身份如何作用于意义生成活动,可通过符号场域与发送者(传播主体)、符号场域与文本(传播文本)、符号场域与接收者(传播受众)之间的互动影响呈现出来,亦即通过传播途径、传播过程体现出来。由于传播过程是个多要素互动的过程,为了更好地表述出传播过程的结构和运动态势,笔者将从诸多学者总结出的传播模式入手,分析日常生活中符号在场的传播活动。

不同阶段总结出的传播模式具有不同阶段的印迹。譬如,信息论影响下的符号传播过程是线性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拉斯韦尔模式和香农—韦弗模式;控制论影响下的符号传播过程则强调了其反馈性,以奥斯特古德—施拉姆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

式为代表;系统论影响下的符号传播突破了传播过程的内部探索,即将传播模式放置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考量,以赖利夫妇模式、马莱茨克模式、梅尔文·德弗勒模式为代表。除了上述基本模式之外,丹尼斯·麦奎尔及其助手斯文·温德尔又归纳出了四大传播类型“个人影响、扩散和大众传播对个体的影响模式(刺激与反应模式及其修正、两极传播模式、创新扩散模式等五种模式);大众传播对文化与社会的影响模式(间接与直接模式、议题设置、大众传播依赖模式、沉默螺旋模式等五种模式);受众中心模式(使用与满足模式、使用与效果模式、信息寻求模式等三种模式);大众媒介的体系、制作、选择与流动模式(比较媒介体系模式、媒介组织模式、守门人模式等七种模式)<sup>[9][P124]</sup>。实际上,上述传播模式又可归为两个大类:一为呈现符号传播过程及其结构的模式;另一为呈现各符号传播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模式(如强调受众、媒介、效果的模式)。在上述符号传播模式中,场域性的体现以及意义的出场方式皆有不同。

就线性传播模式而言,整个符号场域的传播是单向流动的。香农—韦弗传播模式中的噪音元素将场域性(边界)凸显了出来。这是因为噪音可以是系统内的/系统外的、人为的/自然的,它对符号意义(正确信息)的传递有着干扰作用。此时噪音的显现不仅影响了符号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传受符号的差异,还将整个场域边界划分了出来。可以说,在线性传播模式之中,意义的生成与传播有赖于噪音的排除(需要处理好噪音、冗余信息、平均信息之间的关系)亦即明晰纯符号场域边界,可以保证符号意义(正确信息)的“出场”(即传播与接收)。

就控制论观照下的传播模式而言,整个符号场域的传播是双向互动的,符号场域(边界)在符号的发送者与接收者的交流互动(双向回路)之中形成。其中符号的发送者与接收者(编码者与译码者)是对应与对等的,尽管二者的活动均受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影响,也受其所在社会文化环境制约,但是该传播过程仍旧是独立于社会的自我运行的系统过程。在控制论传播过程模式中,符号场域边界在传播者、接受者的互动作用中逐渐凸显出来。但由于整个过程是独立于社会的自我运行系统过程的(即强调传播者独立于社会),其意义的生产过程并未触及整个符号传播的社会背景。

就系统论观照下的传播模式而言,整个符号场域不仅仅只围绕着传播的基本群体,还将整个社会

体系纳入其中,也即是更为宏观的传播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工作“组”即群体、社会环境、由媒介内容的公开性所产生的压力和约束、来自媒介的压力和约束、来自讯息的压力和约束(马莱茨克模式传播因素);法律力量、经济力量(德弗勒模式传播因素)等等,均作用于符号发送—接受行为之中,影响符号意义的传播。比之于控制论观照下的传播模式,符号意义的出场受多维因素作用,其场域范围也不止局限于单纯的循环回路之中。

可以说,从线性传播模式到系统论观照下的传播模式,符号场域的边界是逐渐向外推移的,它由进行自我传播的心理场域开始扩展——内部系统转向外部系统,延展到大众传播场域。由此,关于“场域”的研究既涉及微观场域,也涉及宏观场域。其中,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信息化、文化的大众化等方面使得传播过程中的控制参量不断发生变化。这一变化通过在场者的符号身份呈现出来,并且在作用于在场者与接收者的受传关系之时,影响意义的生成活动。实际上,本文第一部分梳理“场域”源流之时,也印证了不同“场域”之中,个人因素、社会背景等因素对意义生成机制的影响作用。笔者对符号场域进行分节,透过不同阶段的传播模式展开说明,则意在理清日常生活传播过程中在场者、场域、意义生成之间的影响关系。

综上所述,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概念即是指符号场域,它具有空间结构性。从舞台上的演示性行为到社会生活中的演示性行为,我们会发现上下两重符号场域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支撑起符号意义的生产过程,外在于人的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置身性空间也会影响意义的生成传播。即符号场域的空间性关系、人的置身性位置这些在场的空间性结构方式会通过赋意行为作用于传播效果,它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活动呈现出来。

#### 参考文献:

- [1] 刘海龙. 大众传播理论: 范式与流派[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 Kurt Lewin.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M]. NY: Harper & Row, 1951.
- [3]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M]. 林骥华, 等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4] 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M]. 何一,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5]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M]. Vol. 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 [6]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7]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M]. 李孟,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8]皮特·特洛普. 符号域: 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J]. 符号与传媒, 2013(6).
- [9]胡正荣. 传播学总论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 [10]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1]梅尔文·德弗勒, 等. 大众传播学诸论 [M]. 杜力平,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0.
- [12]郑晨予. 虚拟/增强现实的虚拟传播模式建构——基于数字智慧与媒介特性的解构融合 [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4).
- [13]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 Semiotic Analysis of “Field” Theory

HU Yi - wei

(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word “field” in different fields has different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which refers to the place of human survival ,or the space people created by the practice. Among them ,the situation of the fields and the location of person would affect the meaning of the sign. For insight into the law of generates activity on significance ,we could combine the origin of the word “field” after articulating the “field” of sign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y.

**Key words:** the “field” of signs; meaning activity; articulation; communication mode

( 责任编辑 书华)